



如春雨之润花,如清渠之溉稻

——也看《沉默的荣耀》

□ 逢春阶

最近出差东北,坐绿皮火车26个小时,看到一个小伙子趴在卧铺上追剧,一道就七八个小时,我问什么剧?答:《沉默的荣耀》。这么长时间趴着看不累?不累,扣人心弦。他一边跟我对话,眼睛却还是黏在手机屏幕上,我也打开手机,开始看,一直从山海关站追到了牡丹江,一口气看了7集,恍惚成了吴石的战友。我昂首挺胸跟小伙子聊着这部刚走出车站,俨然成了老朋友。

这就是一部优秀电视剧的魅力啊!我想起了若干年前读《曾国藩家书》,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谈读书体会,提到了“涵泳”的概念,我一下子就记住了。他是这样解释的:“涵泳”二字,最不易识,余尝以意测之曰:涵者,如春雨之润花,如清渠之溉稻。雨之润花,过则小则难透,过大则离披,适中则涵濡而溢滋;清渠之溉稻,过则小则枯槁,过多则伤涝,适中则涵养而沛兴。泳者,如鱼之游水,如人之濯足……”

“不慕古,不留今,与时变,与俗化”

《沉默的荣耀》有“涵泳”之美。它不提供快餐式的消费体验,而如一壶老酒,一杯醇茶,需静心品尝,方得滋味。它让我们在历史的静默深处,听见了信仰的回响,在英雄的人性光辉中,感知了英雄的鲜为人知之。这部作品不仅是对一段尘封历史的梳理,其本身,就是一场成功的、关于信仰与崇高的现代美学实践。

与《潜伏》《风筝》《伪装者》等谍战剧依靠悬念吸引观众不一样,《沉默的荣耀》选择了一条没有悬念的叙事道路:开篇就揭示了吴石、朱枫等“向死而生”的悲壮结局。这怎么说呢?应该说超越悬念的审美吧,或者叫悬念前置的美学追求。观众不再纠结“吴石他们能不能活下来”,而是将情感聚焦“他们如何走向生命的终点”,观剧体验便从表层的猎奇,升华为对生命过程与信仰价值的深沉品味。每一个化险为夷的瞬间,不再带来简单的松快,反而因其对最终悲剧的倒计时更显得沉重与珍贵。一个个故事情节,像随风潜入夜的春雨,润物细无声滋润每个观众的心灵,进而思考理想、信念、家国情怀,还有更多的人生感悟。

好的电视剧,都有静水流深的张力。《沉默的荣耀》摒弃了火爆的枪战与炫目的追逐,将惊心动魄内化于茶杯的微澜,指尖的颤抖和眼神的交会。这种“于无声处听惊雷”的叙事策略,要求观众屏息凝神,细心涵泳,方能体会那平静水面下汹涌的暗流。其分寸的把握,如渠中灌溉水稻的清水。或者说,水到而渠成。

贴着人物塑造,最能共情。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将军,可谓身居高位,但在家里则是会在妻子膝上安睡,是牵挂叛逆女儿的慈祥爸爸。他酒后唱起闽南歌谣《我身骑白马走三关》寄托乡愁。在朱枫牺牲后,那句凄然的“她只是想回家!”的呼喊,更撕开了他内心压抑的柔软与痛楚。这些细节让英雄的形象可感、可触、可敬、可爱。他们的牺牲也因此更具震撼人心的力量。“家庭”元素在剧中不仅是叙事情境,更是情感升华的关键。吴石府上聚餐时,暖曦唱起家乡童谣《天顶一块铜》,吴夫人碧莹吟唱昆曲《牡丹亭》等,都处理得温婉动人。这短暂的温馨与即将到来的风暴形成残酷对比,将个人情愫自然融入家国命运的宏大叙事。而反面角色谷正文也塑造得有棱有角,他训练部下打入地下党内部,说:“你要打入内部,就必须像共产党人一样无惧生死,真信,才能不被识破。这种对复杂人性的把握,都恰到好处。谷正文这个反派角色不再是概念化、扁平化的,以致好多年年轻人的“弹幕”,调侃谷正文是害人精,却还“精益求精”呢。

《沉默的荣耀》以“大事不虚,小事不拘”为创作原则,营造出一种庄严的历史真实感,为达到“涵泳”的效果提供了深邃的时空背景。我了解到,剧中八成以上重要角色使用真实姓名,情节主线高度贴合史料。创作团队从档案中拾取细节,将尘封的卷宗转化为可感的命运,让历史不再是遥远的符号,而是能与当代对话的鲜活存在。

《沉默的荣耀》的热播,引发了海峡两岸观众的共鸣。我看到媒体报道,许多观众在观剧后,自发前往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缅怀先烈,台湾也有民众到吴石、朱枫、陈宝金、暖曦等烈士就义处自发悼念。这一幕生动表明,作品成功地架起了一座历史与当下的桥梁,让75年前的精神信仰,依然能照亮并滋润今人的心灵,激励我们思考自身的所作所为。而这一切,离不开《沉默的荣耀》主创团队对“涵泳”美学效果的追求。

念兹在兹,长眠于斯。除了思想精神,一代贤哲给齐地,还留下了许多更为具象生动的“宝藏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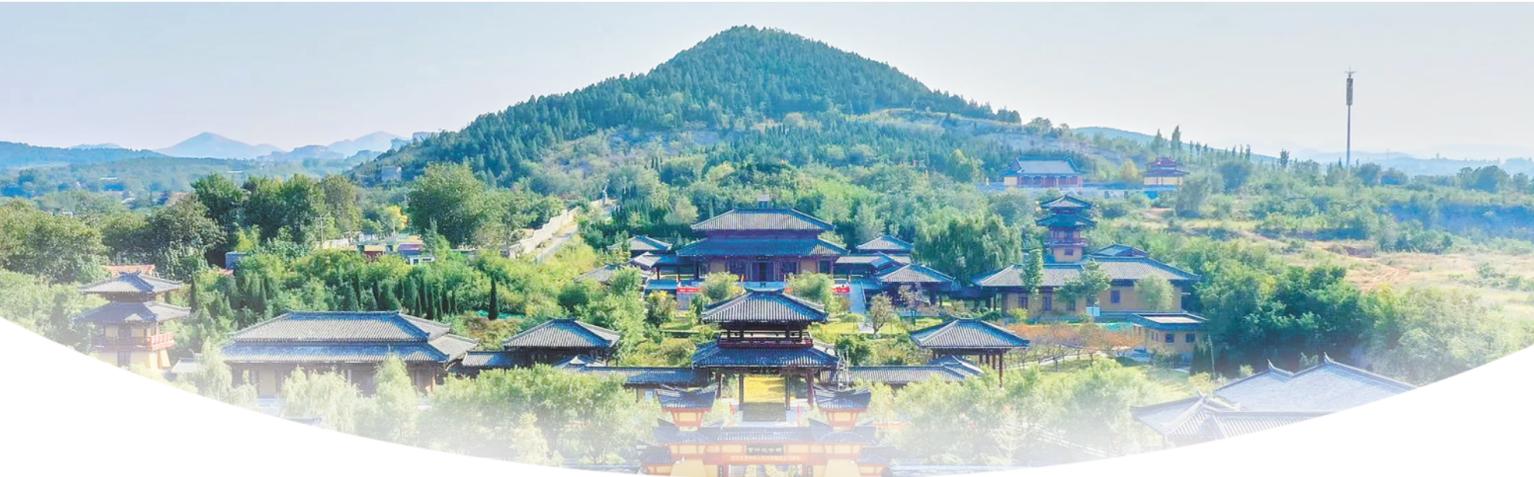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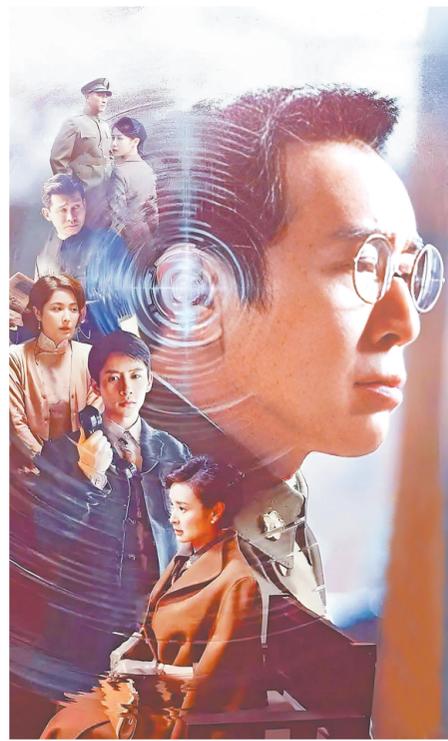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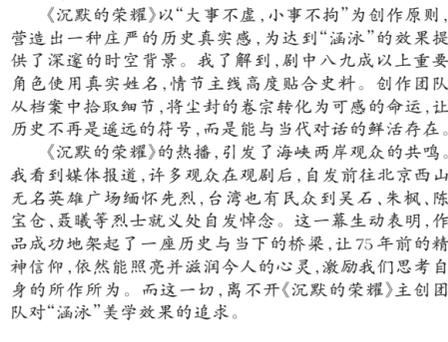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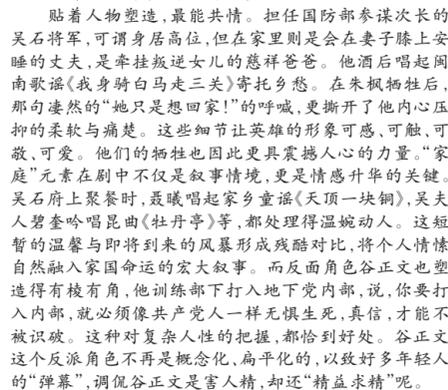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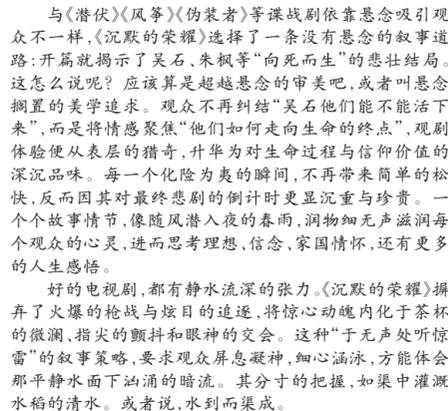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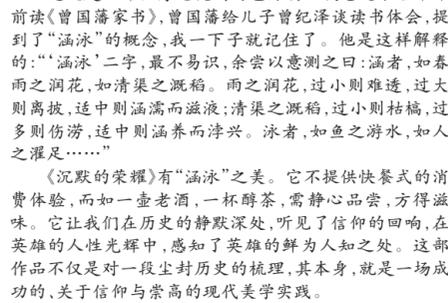
苍松翠柏间,管仲纪念馆如一块沉埋千年的璞玉,依托管仲墓的古脉而生。这座串联起田齐齐陵、太公湖等胜景的场馆,将齐文化的根脉与山水灵秀熔铸,让春秋贤相的风骨跨越千年而来。

馆前广场的巨人大雕,堪称点睛之笔。管仲左手仗剑镇山河,右手执书履丘墓,眉宇间凝着一匡天下的英气,仿佛仍在推演富国强兵的良策。

拾级而上,五座展厅循着管仲生平,徐徐铺展。序厅“管鲍之交”以江南砖石庭院为韵,淡黄石材映着砖雕壁画,将二人患难与共的知己情、胸怀天下的鸿鹄志定格其间。穿廊桥南行,“桓公拜相”厅仿现场景,再现了管仲从阶下囚到辅国相的跌宕传奇,光影流转间,仿佛能听见君臣相得的千古佳话。“管仲治齐”厅以田园外景为衬,两道过门似通古今,将改革内政的波澜壮阔,管子思想的博大精深铺开。“首霸春秋”厅一边是经济改革的富国之策,一边是尊王攘夷的盟会盛景。最后的“光照千古”厅,石质回廊绕着病榻论相的铸像,仿古竹筒上的箴言字字经典。

出展厅过管仲祠,尽头处,冢墓巍然。高大的封土被青松翠柏环抱,牌坊静立。碑刻上,“齐相管夷吾之墓”赫然入目。风穿林叶,如闻春秋古音……

高台教化,有形又无形。在这座建筑里,“探齐之旅”剧本杀让玩家化身历史角色,于谜题中解锁齐文化密码;古法蹴鞠的非遗体验,让人们在酣畅淋漓中体悟齐风意气。凭栏而望,牛山庙会的烟火气,与管仲纪念馆的历史厚重相融共生。秋光中,齐文化的务实与开放,代代相传。



□ 本报记者 张九龙 蔡可心

“相桓公霸春秋一匡天下名千古,富民众强国家九合诸侯顺八方。”淄博市临淄区管仲纪念馆大门的楹联,道出了治国奇才管仲的人生成就。他以四十年相业为笔,以齐国疆域为纸,写下了一部富国强兵的鸿篇巨著。这位“中华第一相”还被今人誉为“贸易战鼻祖”“中国古代的凯恩斯”。

对于经济规律的探索,古今中外从未停止。两千多年前,管仲一系列经济举措,植根齐地土壤,兼顾理想与务实的治国智慧,不仅让齐国崛起,更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治理的典范,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,提供了镜鉴。

“利出一孔”,为国聚财

秋染牛山,重阳庙会的喧嚣,唤醒了临淄的古老记忆。这座不起眼的小山,每逢农历三月三、九月九,总是游人如潮。人们至此登高祈福,在商贸集市间寻觅烟火,于书画展演中触摸文脉。

牛山北麓,正是齐相管仲的长眠之处。管仲有句名言:“仓廩实而知礼节,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两千六百多年过去,他仿佛还在守护着百业兴旺、齐地安康,他的传奇谋略也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着“化学反应”。

时间回到春秋时期,中国处在转型关键节点。诸侯为争夺土地、人口和资源,展开白热化竞争。社会结构也剧烈变动,原来的宗族管理体系失效,新兴地主和商人地位上升,小手工业者,小土地私有者越来越多,“工商食官”制度名存实亡。

齐国的金属冶炼、制陶、纺织、酿造等技艺闻名天下。管仲接手相位后,将姜太公“通商工之业,便鱼盐之利”的国策发扬光大,形成了系统化的国家治理策略,其中的经济学思想,被梁启超称作“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”。

想成就霸业,必须有强大经济实力。春秋时期,粮食是国家财富的基本衡量标准。然而,在管仲的认知里,财富从来不止于粮食。他将山林藪泽、土地矿产、铁制农具、水利设施乃至货币,都纳入了财富体系。他明确提出“黄金刀币,民之通施也”,将货币视为一般等价物。

如何积聚力量?管仲的核心经济主张是“利出一孔”,即国家必须掌控核心资源分配权,“予之在君,夺之在君,贫之在君,富之在君”。在他看来,粮食是“万物之主”,是治国根本;盐铁是民生刚需,是财政命脉。粮食储备制度,盐铁专卖制度应运而生。

“以丰补歉”的国家储备体系建立起来。丰收之年,粮食价格下跌,国家以平价大量收购余粮,避免谷贱伤农;灾荒之年,粮食短缺,国家再以平价抛售储备粮,平抑物价,阻止商人囤积居奇。他还通过适度提高粮食价格,吸引周边国家的粮食流入齐国,让“滕鲁之粟四流而归我”,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。

盐铁专卖则是管仲的“财政利器”。齐地出产盐铁,管仲推行“官山”“官海”之策,将盐铁开采、生产、销售大权收归国家。铁矿开采“官有民营”;官府严禁私人开采,违者重罚,但允许百姓在官府监督下劳作,收益按“民七君三”分配,此举既调动了劳动者积极性,又保证了国家收入。盐业则由国家完全垄断,将食盐高价出口到缺盐的晋、宋、卫等国,“得成金万一千余斤”,积累了巨额财富。

难得的是,管仲居然有货币调控意识,根据供求变化,利用“轻重之术”调控市场价格,“使物一高一下,不得常固”。他的“币有轨”思想,认识到货币流通有客观规律,国家应根据人口、土地、粮食产量等因素,计算货币流通的必要量,确保货币发行量与经济发展相适应。

社会财富的创造,根本靠人。为让蓝图变成现实,管仲决心重塑社会组织架构,充分释放人的活力。

春秋初期,“国”“野”制度崩坏,人口流动频繁,社会秩序混乱,不仅影响生产,也危及国防。管仲推出了“叁其国而伍其鄙”的行政区划改革与“四民分业定居”的职业管理制度。

一方面,他将齐国疆域重新划分:都城及周边的“国”分为二十一个,其中士农之乡十五个,工



管仲经济学：富国强兵的齐地智慧

商之乡六个,由齐桓公与国子、高子分别管理;偏远的“野”“鄙”地区则分为五个属,设立各级官吏层层管辖。这一改革打破了贵族与庶人之间的阶层壁垒,将社会控制权从宗族体系转移到行政体系,强化了国君集权,也稳定了经济环境。

另一方面,他将民众按职业分为士、农、工、商四类,要求他们“群萃而州处”,且职业世代相袭。同业聚居便于子弟耳濡目染,通过父兄言传身教传承技艺;同业者朝夕相处,利于经验分享与技术创新;职业固定则减少了人口流动带来的动荡,保证了劳动力与国家兵源的稳定。

“夫霸王之所始也,以人为本”

产业布局,事关长远。管仲立足齐国的产业基础,将工商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,做强“长板”。他提高了工商业者地位,将士、农、工、商并列为“国之四民”,打破了“士贵商贱”的传统偏见。设立专门管理机构,在都城设置“工商之乡六”,任命“工正”“工师”“铁官”等官吏,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与技术指导。

管仲意识到,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,直接决定产业发展上限。因此,提出“夫霸王之所始也,以人为本”,将人口与人才视为国家富强的根本。他推出了一套务实的“增人”政策:宽政、薄赋、弛刑,为百姓创造安定环境;鼓励生育,“丈夫二十而室,妇人十五而嫁”;对多子家庭减免赋税;关爱弱势群体,设立救济机构,让“饥者得食,寒者得衣,死者得葬,不资者得赈”,这些措施使得齐国人口快速增长,劳动力日益充沛。

他当然知道,人力并不等于人才。为吸引和培养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,管仲提出重奖农业、畜牧业、林业、园艺、医药、蚕桑等领域的人才,明确规定“民之能明于农事者,置之黄金一斤,直食八石。民之能蓄有六畜者,置之黄金一斤,直食八石”,还免除他们的兵役,鼓励专心钻研技术,推广经验。同时,他主张聘请民间工匠与国外“良工”,促进技术交流,提升齐国手工业水平。

除了做强实体经济外,管仲还把对外贸易当作重头戏。他遵循“天下下我高,天下轻我重,天下多我寡”的原则,紧缺物资通过抬高价格吸引流入,富余物资则适度降价扩大出口。为鼓励外贸,实行税收优惠政策,关税与市税只征一项,甚至为外国商人免费提供食宿,运输便利,出现了“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”的盛况。同时,以临淄为中心,打造商业城市群,齐国成为天下商贸中心。

兵无常势,水无常形,政策也需要动态调整。后来,齐国实力逐渐壮大,通过军事扩张,疆域已“方五百里”。一边是耕地增加,另一边是“民舍本事而事末作”,导致农业劳动力流失。此时,周边国家灾害频繁,粮食外运断绝,隐患重重。管仲及时调整了政策,从注重工商转向以农为主,兼顾工商。设置“司田”“司空”等农官,加强农业管理;强调“不夺民时”,保障农业生产;提高谷物价格,增加农民收入;推广施肥,土壤改良技术;支持农田水利建设……通过这些措施,有效稳住了国民经济基本盘。

快速发展中,难免会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。管仲敏锐地提出“贫富有序”的治理原则,主张通过行政、经济手段进行控制。信贷上,设立“平乘之币”作为公用基金,农忙或灾荒时,向农民提供种粮贷款,收获后偿还,使得农民免遭高利贷剥削。财税上,实行差额征税,推行弹性税率,减轻农民负担。行政上,通过准入限制,禁止富豪与民争利,保障贫民就业权利。甚至还出台了提振消费措施,鼓励富人“修官室台榭”,创造就业机会,促进财富再分配。

在制度创新方面,管仲的“相地而衰征”,堪称土地税制的划时代变革,最为后世称道。

西周实行井田制下的劳役地租制度。农民需先耕种贵族的“公田”,再打理自己的“私田”。到了春秋时期,农民对“公田”劳作消极怠工,导致“公田不治”,而贵族通过开垦“私田”积累财富,社会贫富差距扩大。同时,“赋”“税”不分,剥削沉重,引发农民逃亡、社会动荡。

针对弊病,管仲精准施策。“相地”即考察土地的肥瘠、地势高低、水源深浅等自然条件,将土地划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等;“衰征”指根据土地等级,征收不等额的实物地租。

这是“一箭三雕”之举。一是废除劳役地租,实行实物地租,减轻了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。农民可以自主安排耕作时间,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。二是体现了公平原则,土地优劣与赋税轻重挂钩,避免“取民无度”。三是释放了农民开垦荒地的积极性,耕地面积扩大,国家财政收入随之增加。

在此基础上,他实行弹性税率,减免养老育幼家庭、孤儿收养家庭的赋税,合理确定征税期限。主张“寓税于价”,通过盐铁专卖,提高粮食价格等方式,将赋税隐蔽地纳入商品价格中,实现“民无废事而国无失

